

台灣史研究集外集



戴國煒文集 5

戴國煒著

戴

國

煇

文

集

5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

戴國輝文集【5】

台灣史研究集外集

作 者——戴國輝

照片提供——林彩美

總 策 畫——王曉波

主 編——林彩美

執行編輯——陳淑美・李佳穎・洪淑媛

封面設計——唐壽南

出 版——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・南天書局有限公司

發 行 人——王榮文(遠流)・魏德文(南天)

出版發行——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

電話◎(02)2365-1212 傳真◎(02)2365-7979

郵購劃撥帳號◎ 01894561

南天書局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1 樓

電話◎(02)2362-0190 傳真◎(02)2362-3834

郵購劃撥帳號◎ 01080538

香港發行——遠流(香港)出版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四樓 505 室

電話◎ 2508-9048 傳真◎ 2503-3258

香港售價◎港幣 2000 元

著作權顧問——蕭雄淋律師

法律顧問——王秀哲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2002 年 4 月 1 日 初版一刷

全套售價◎新台幣 6000 元 (套書不分售)

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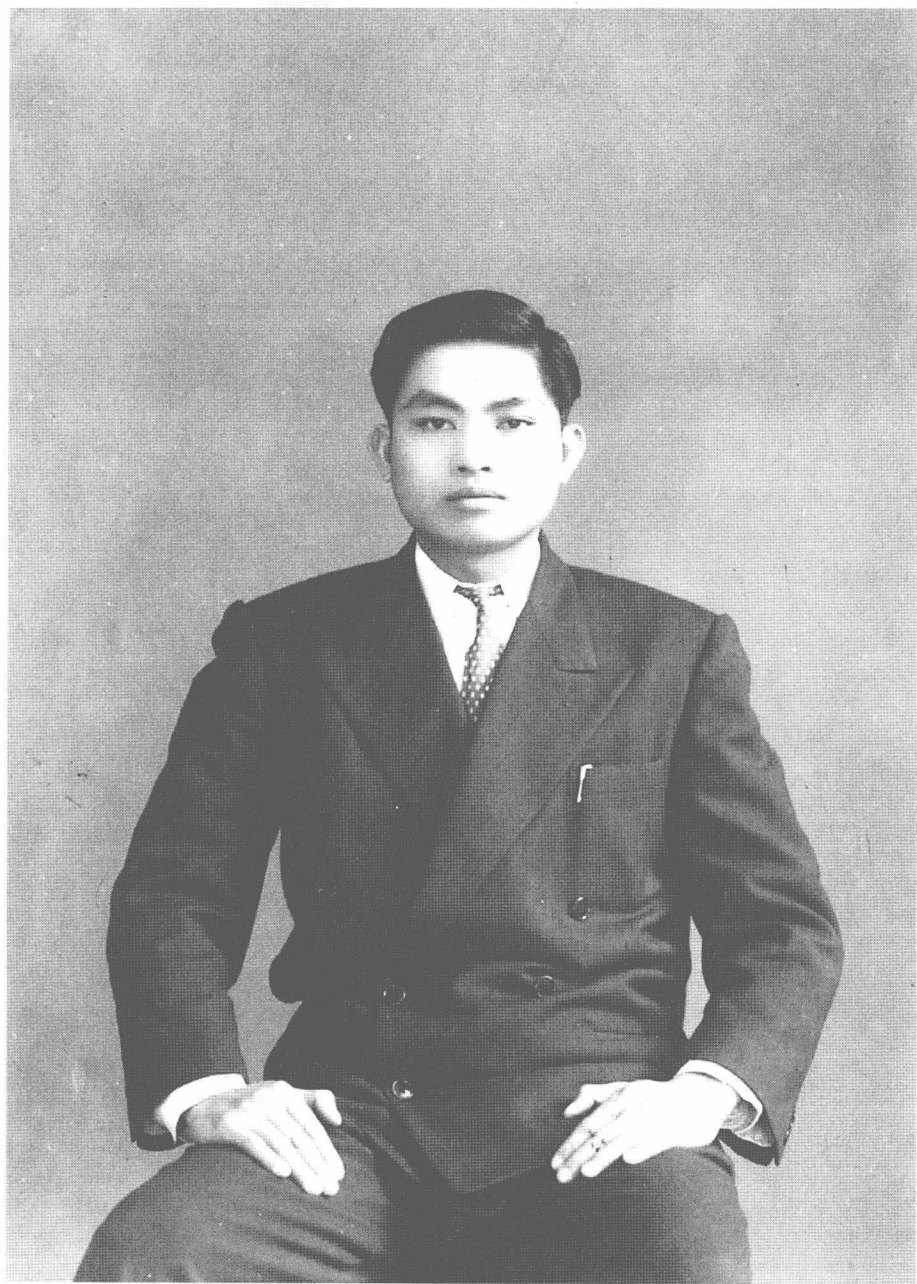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32-4586-8 (套)

Ylib 遠流博識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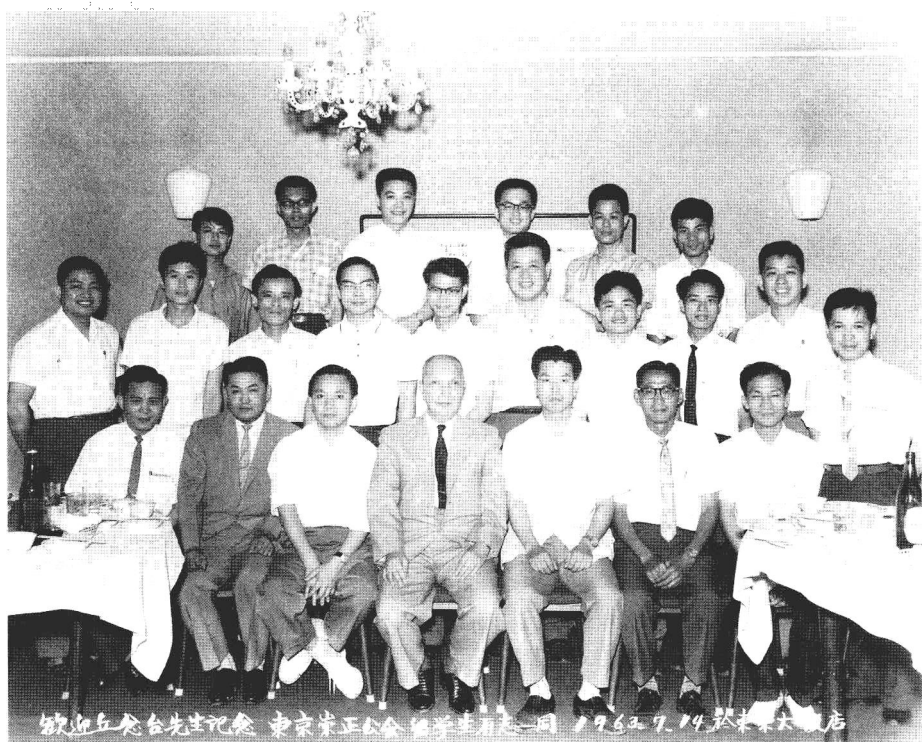
<http://www.ylib.com> E-mail: ylib@ylib.com

南天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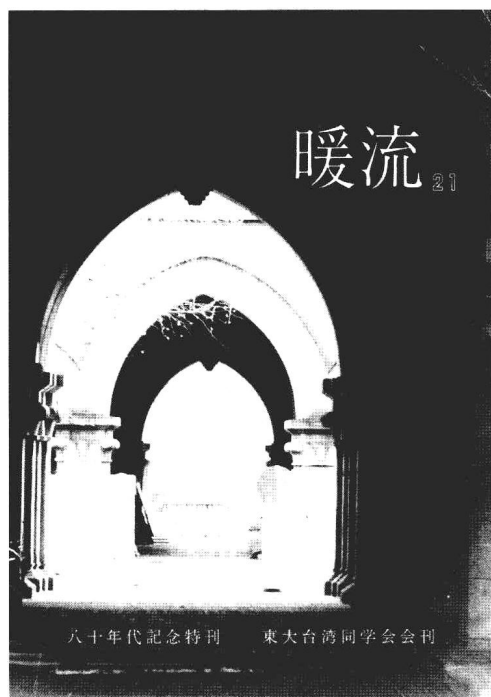
<http://www.smcbook.com.tw> E-mail: weitw@smcbook.com.tw



1955年戴國煇剛赴日時著西裝留影



1963年丘念台先生（前排左四）赴日與東京客籍同鄉會餐聚後合影。前排左一為大陸人蕭耀章、左二為外交官廖運和，第二排右一為東大中國同學會第十一期總幹事賴石傳、左三為第四、五期總幹事陳仁端，戴國輝（第二排左一）為創會暨第二期總幹事。當時台獨運動已開始活動，丘念台係為國民黨安撫留日學生而來



原為「東大中國同學會」會刊到二十一期就被
篡改為「東大台灣同學會」會刊



戴國輝與王曉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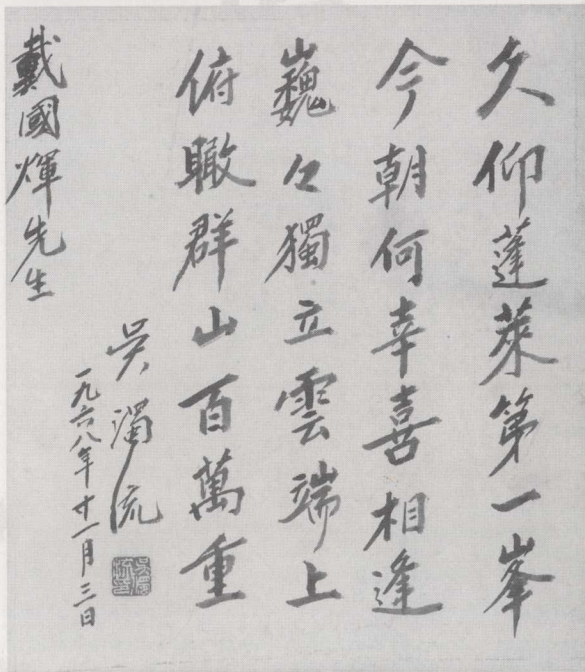
吳濁流（左一）訪日時與戴國煒一起去湯河原旅行。兩人在旅館前合影



吳濁流與林彩美及興宇、興寧合影。身後的千葉戴宅亦接待過王作榮院長、李登輝、東京大學東畑精一教授等人



戴國輝安排日本學者與吳濁流相聚。前排左一為橫濱市大校長加藤裕三、後排左起為一橋大學教授松永正義、東大教授若林正丈、橫濱市大教授矢吹晉



吳濁流墨寶



1972 年楊達赴日時，戴國輝安排與日本蘇聯專家內村剛介教授對談



1982 年楊達在美歡渡生日，左立者為葉芸芸



1992年戴國輝赴北京「台灣研究所」為大陸學者講解兩岸關係及台灣相關問題。左二為大陸研究所所長江殿銘



戴國輝與許信良對談「台灣人的角色與舞台」



1998年2月12日戴國輝引中日相關人士參與「日據時代民俗台灣，在台灣復刻」座談會。右一為南天書局社長魏德文



2000年12月2~3日戴國輝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學術研討會

浩然千古見文章

——戴國輝著《台灣史研究集外集》代序

戴國輝教授（一九三一—二〇〇二）逝世一周年了，今年四月十五日正是他七十歲冥誕，戴大嫂林彩美女士及戴教授生前的學生和朋友們，為紀念戴教授，情商出版生前著作的遠流出版公司、南天書局、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和國史館，將戴教授所有的中文著作彙集成套，成為一套戴教授中文著作全集（不含戴教授日文著作），另外再編輯一本學生、朋友和媒體追悼戴教授逝世的紀念集。在編輯中文全集的過程中，戴大嫂和戴教授的學生，又發現了不少戴教授尚未發表或未能及時編輯成冊的文稿，由於字數還不少，所以只好另編成冊，成為中文全集之外的一集「集外集」，戴教授以研究台灣史為職志，他以中文出版的第一本書又名為《台灣史研究》，所以，大家覺得可以定名為《台灣史研究集外集》。

戴教授生前出版的每一本書幾乎都有他自己的自序或前言，但他已不可能再為這本「集外集」作序了，所以，戴大嫂希望我能為這本「集外集」作序，以「解讀」戴教授的學術思想。作序或「解讀」實不敢當，但戴大嫂有命又不敢不從。所以，只好把拜讀戴教授著作的心得和啟發做一篇「讀書報告」罷。

在戴國輝台灣史研究中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即「主體性」，而有「自我認同」，而有「出生的尊嚴」；破壞「主體性」，而有「共犯結構」。自戴國輝提出台灣史研究的「主體性」之後，現已成為台灣史研究的「共識」，但又產生了不少的歧義和爭議，所以，要了解戴國輝的台灣史研究就必須把握「主體性」概念，還必須釐清「主體性」的歧義。

戴國輝在〈台灣客家的認同問題〉一文中說到：

「社會科學領域裡的『認同』概念是Erikson所提起的。『認同』二字有它正負兩面的意義。若當名詞來用則其意義類似於『自我同定』的。而Erikson的identity的內涵是辯證的、是動態的、是歷史連續的、是環境及社會變動所制約的，甚至包括人性心靈從幼年到老年人心靈變動的總合性過程。所以在心理學上而言，可稱之為人的自我同定；在社會學上可稱為人的自我存在證明；在哲學上則可稱為人的主體性。」

但由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歷史連續性以及人格同定性，它便不止於停留在自我之上，這主要的『自我』，會隨著時間及空間逐漸成長、擴大，而個人參與社會組織或社團也會隨著時間和空間逐漸開展。在這種過程當中，『自我』將會慢慢地形成、獲得某種概念與意識，而會跟另外一個社會或世界所逐漸形成的概念與意識相互對比，而為自己找尋出角色定位。『自我』便慢慢會向一個團體的價值認同，逐

漸地建立自我的主體。」

「主體」(subject)是指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；相對的「客體」(object，或譯為「對象」)是指主體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對象。這種概念在西方哲學史上早就出現過，亞里斯多德在《範疇篇》中言：「第一實體之所以最正當的被稱為第一實體，是因為它們乃是所有其他東西的基礎和主體。」費爾巴哈也曾說：「存在是主體，思維是賓詞。」馬克思也說：「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。」這是「主體」在本體論中的意義，是指某種特性、狀態和作用的承擔者。

到十七世紀，主體和客體更成了認識論研究的中心課題。霍布斯區別了作為感覺的主體和作用於主體而產生感覺的客體。笛卡爾把主體自我意識同客體現實世界對立，而把主體自我意識作為分析認識（論證）可靠知識的出發點，而言「我思故我在」。但也有培根認為，人必須超越自我主體的局限性，才能真正認識客體自然世界，而有「四大幻象說」的「洞穴幻象」。康德提出「先驗主體」，認為「綜合是主體自我能動性的活動」，是形成一切客體知識的條件；但他又以客體為「物自體」，認為「物自體是不可知的」。但無論如何，失去了認識的主體，是不可能產生任何認識的；失去了認識的客體，任何的認識都將失去客體的真實性。客體又可分為「自然客體」「社會客體」和「精神客體」。人的認識，無論如何，必須是在主體與客體的互動中產生，在不斷的互動中發展和提昇的。

除了本體論和認識論外，「主體」亦當有其價值論或道德論上的意義。善惡好壞的價值道德判斷，不是根據客體存在，而是根據目的，目的是人的主體所規定的，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道德的主體，康德才

會認為必須以人爲目的，不可將人當作手段。

人的主體是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形成的，也是受到社會存在制約的。所以，主體又可分爲個人主體、集團主體、社會主體。

「主體性」和「主觀性」英文皆作 *subjectivity*，*subjectivity* 有兩義，當可以中譯予以區別。「主觀性」是指主觀隨意性，是主觀觀念論的思想方法特點，不承認外在世界存在的真實，中國的禪宗、王陽明和英哲柏克萊均屬主觀觀念論。「主體性」係指人在主體與客體關係中的地位、能力、作用和性質，其核心是人的能動性問題。康德就認為，知性與感性之不同在於感性有接受觀念的能力，而知性卻是意識的主動性，他說：「意識從其自身產生觀念的能力，認識的主動性，就應該叫做知性。」

戴國輝以 Erikson 的「認同」來說明哲學上的「人的主體性」，並沒有脫離西方哲學史的範疇。

二

戴國輝的台灣史研究不同於一般史家，是從強烈的「主體性」出發的。戴國輝是出生於日據下一九三一年的台灣客家人。在閩南人佔多數的台灣，客家人是居於少數弱勢的地位。再者，日本的殖統治，台灣人（無論閩客）只能居於被支配民族的地位。

台灣殖民地還有異於其他地區殖民地，許多其他地區殖民地是整個民族的被殖民，其祖國已不存在，而台灣人爲中國漢民族，雖台灣人被殖民，但中國仍然存在，台灣人的祖國並沒有亡國。因此，台灣

人的政治認同究竟是認同中國祖國，還是認同殖民母國日本，而出現矛盾。

從「主體性」出發的戴國輝台灣史研究，一開始就不能不帶有這「主體性」的烙印。作為台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和承載者，戴國輝對其「主體」的形成是有深刻反省的。在〈「中國人」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〉一文中，他有過這麼一段自述：

「我特別是要談我從小到小學這一段期間，黃帝子孫論在我家的情形。家祖父、家父當年常常一而再日而月地要強調我們是黃帝的子孫！這當然是針對當年日本統治者——一個外來的壓力，一個權威，且是侵略民族相對抗而強調的。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，那一年，發生了九一八事件。等到『七七』的時候，我在唸小學。那時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，要逼著我們改姓名，獎勵年輕人參與日本軍的侵略行爲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家父很怕我這個公兒將來會被同化成日本人。那時我的哥哥們，有的在東京、有的被動員徵傭到南洋，只剩下公兒在身邊。天天給日本老師灌輸『日本國體論』——萬世一系的天皇、偉大的大和民族和大和魂。家父當然希望能夠把這個公兒拉回中國人這邊來。中國有一句話『言教不如身教』，我們家過舊曆年第一天，所謂開正，要拜天公、祭祖、貼春聯……等等。拜天公的時間還得看當年的干支來決定。我相信家祖父和家父等老一輩是透過這些祭祖、拜天公，一而再地強調我們係黃帝的子孫等來教育我們這一輩，叫我們不能且不要變成日本人。」

但是，受皇民化教育和被灌輸「日本國體論」的幼年的戴國輝並不因具有強烈中原意識的客家人父親而有「黃帝子孫論」的認同，在〈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的往事〉中，他敘述有一位被徵召大陸當軍伕

的鄉親返鄉和他父親談及日本在大陸戰場的殘暴，他說：

「現在每每回想起來，猶令我臉紅的事：當晚，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講話的我，突然爬起來，大聲說道：『日本軍是皇軍，不會幹出那種壞事！』」

這事發生得太突然，以致大人們全給嚇得面無人色，手足無措。紛紛到我跟前，誠惶誠恐地訓誡我，今天這番話一旦洩露出去，他們全都會坐牢，那軍伙可能給警察大人逮去，也可能被宰掉。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，當我爬起來大聲說出上面那兩句話之前，還聽到父親說道：『這場戰爭的勝敗已定，日本兵敢於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暴行，斷無戰勝中國之理。我們回歸唐山懷抱的日子，也就不遠了啊！』」

日據時代，日本統治台灣是實施民族差別政策的，在教育上，分台人子弟讀的公學校和日人子弟讀的小學校，後雖宣佈實施「共學制」，但實際情形並未改善。戴國輝念的是公學校，好不容易考取了州立中學，在〈隱痛的傷痕〉一文中，他記述進入中學後的一個故事，他說：

「『你這個混蛋東西，是從那裡滾進來的臭清國奴，哼！明年再也不讓這類東西進校門！』」

這野蠻、惡毒的吼聲，曾經深深地傷害了我幼小的心田，震撼了我的生命。如今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整整有三十年了。這一片往日的傷痕，依然清晰地遺留在我心靈深處，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，隱隱作痛，啃咀著我的記憶，歷久彌新。這傷痕宛如無形的文字，寫出殖民統治下的辛酸和亡國的血淚。」

光復後，戴國輝目睹了「二二八事件」和「白色恐怖」，台中農學院（今中興大學）畢業後，到日本留學。見到睽別已久的二哥，他猶對日本抱持著化不開的情結。在〈戰後台日關係與我〉一文中，他說：